

论点摘编

一 抗击疫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五大优势

程恩富 徐文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多种优势。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抗疫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抗击疫情的实践证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的政治优势。二是坚持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导抗疫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国家高效调控的主要微观实体，在抗击严重疫情的过程中，与其他单位密切合作，显示其积极的主导作用。三是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优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急事的优势。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抗疫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旨优势。“以人民为中心”是各级党和政府指导这场防控疫情阻击战的主旨，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五是坚持“牺牲小我保全大我”气节抗疫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优势。中国人民在面对人类共同命运问题上，向来怀着一种毫无保留的“大我”“大家”的国际精神，“封城封省”发扬了中华民族“牺牲小我保全大我”气节。

（摘自《唯实》2020 年第 3 期）

二 新中国 70 年文化建设成就

张国祚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贫穷落后走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道理，即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波澜壮阔的扫盲识字运动大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识字率,批判《武训传》拨正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涌现的人民创作文学精品繁盛了群众文化。这些成就开启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序幕,在70年的历程中,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一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充分、繁荣发展;二是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不断增强;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文艺发展必须遵循的导向和原则。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自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文化的最大亮点、最有价值的内容、最有指导意义、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影响最大的文化,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起来讲,中国文化波澜壮阔、朝气蓬勃,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未来发展会更加美好。

(摘自《国史讲堂》2019年10月15日)

三 必须说说关于索尔仁尼琴

陈先义

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俄罗斯作家,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发表过对苏联政府有异议的许许多多作品,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因此受到西方嘉冕,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在反思自己全盘否定斯大林、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做法时,索尔仁尼琴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在整个俄罗斯对历史的反思中,索尔仁尼琴这句忏悔之言成为一代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灵真言。今天,在我们全民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有些学者以偶像的名义来教育和开导读者,要大家去读索尔仁尼琴,读这个连作家自己晚年都深感懊悔的作家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是贬低和污蔑我们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疫斗争。但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管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怎样贬损和诋毁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的制度优越性不容置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负责的政党和政府。从千万医疗队员离开武汉时的洒泪惜别,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极大信任,可以感悟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已经深深融入百姓的心里。任何对党群关系的蓄意挑拨,任何对政府和百姓关系的诋毁,都注定徒劳无功。

(摘自《雷锋杂志微平台》2020年3月30日)

四 义和团的悲壮精神不容嘲弄

王美平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寇深祸亟、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背景下的悲壮之举，它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人民抵抗列强侵略的强大精神武器。然而，近年来，一些人指责义和团排斥洋人、洋教，破坏铁轨、电线及一切“洋货”，是“盲目排外”；渲染义和团“排外”的手段，是“烧杀抢掠”“野蛮残暴”；批评义和团宣扬“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是“迷信愚昧”；抨击义和团“落后无能”“以卵击石”，以致“丢人现眼”“祸国殃民”。但是，“盲目排外说”“野蛮残暴说”“迷信愚昧说”“祸国殃民说”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以偏概全，完全否定了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格局下表现出的反帝爱国的历史品格和悲壮的精神气概。毋庸置疑，民族独立是谋求发展的基本前提。面临列强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只有通过武力反抗强暴，才可赢得独立，为现代化奠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加速了清末新政的推进，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后来的革命事业积累了经验教训，它是近代中国进程中极为悲壮而不能随意嘲弄的重要一环。历史研究需要用丰富的史料进行实证，更需要用长时段的视野去审视。如果忽略历史发展的大势，为迎合“猎奇”心理，夸大个别细节，随意解读甚至“戏说”，那是连儿戏也不如的。

（摘自《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

五 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观点比较及其启示

焦佩

随着海外学界不断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执政理念的研究，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热点。从研究整体来看，多样化的研究主体、具体化的研究主题、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其明显的特点。从研究具体内容及其观点来看，研究结论既有基本符合现实的，也有与现实差异较大的。各种观点主要围绕“经济新常态”“创新发展”“法治建设”“文化软实力”“脱贫攻坚”“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关键词展开，其观点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效果两个方面。在价值导向方面，政治和外交问题容易被一些研究者误读误解。而在实践效果方面，政治和外交问题以外的量化指标较多的问题更容易被一些研究者歪曲。究其原因，这种误读与歪曲可能主要是受西方价值观和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碎片化的影响。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学会用他者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隐性传递中国智慧

与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要提高国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有针对性地消解在具体问题上的误解或歪曲所产生的影响。如此，既有助于引导海外中国学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也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国际形象的改善。

（摘自《探索》2020年第1期）

六 《自然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刍议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黄传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创了自然辩证法学科，深刻揭示了自然界自身所蕴含的辩证性、自然科学发展的思维辩证性以及自然科学社会效应的辩证性，形成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科学进行洞悉的有机图景，从而铺垫了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核心架构；自然辩证法学科建制化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后，大体历经归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归属哲学的科技哲学以及谋求自立的科学技术学等学科范式，构成了自然辩证法学科化建制以来历经的主要更迭，这既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的事实构成，也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化推进的学理探求，彰显了自然辩证法人对自身学科归属的不懈追求；展望未来，自然辩证法学科仍可坚守自身的独特禀赋，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境遇而大有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通过破除“大口袋”的思想顾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大传统、结合实际地“与时俱进”、丰实“自然观”“辩证法”两域等途径，促进自然辩证法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总之，延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辟的学科视域，回溯半个多世纪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具体实践，自然辩证法学科仍大有作为。为此，立足新时代，大力繁荣自然辩证法学科，掀起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新高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

（摘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3期）

七 文化奇点：人工智能革命的生产工艺学批判

刘方喜

“奇点（Singularity）”论已成为分析当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革命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框架，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揭示，不断发展的现代科技锻造出越来越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将使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趋近于零，而剩余劳动时间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趋近于无限大；让剩余价值游离出物质生产而转移到文化生产中，精神生产力会获得大发展，必然王国和物质生产领域会越来越趋近于零，而自由王国和自由的精神生产

疆域会趋于无限扩展，由此将引发文化奇点或自由奇点的来临；资本主义一方面为这种奇点来临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是这种奇点真正来临有待克服的制度瓶颈。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革命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但却对蓝领工人雇佣性体力劳动形成威胁；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引发第二次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精神生产力将得到大大提高，但却对白领工人雇佣性智力劳动形成威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瓶颈、扬弃劳动的雇佣性，人工智能将成为精神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手段，自由王国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疆域将会无限扩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重构马克思文化生产工艺学批判，不仅有助于充分认识其文化思想的巨大丰富性，更全面认识其文化理论的完整体系，而且还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自《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八 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及其辩证层级结构

——凯·尼尔森的论证与意义

李义天 刘 畅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界围绕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此产生非道德论者与道德论者的分野和对立。其中，非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评价社会制度，“正义”在社会批判中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而道德论者则相信，马克思持有某种可用于规范性评价的、实质性的正义概念。从表面上看，前者的立场似乎更满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叙述框架，但后者却通过围绕法权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等维度的辨析与澄清，为经典作家文本中那些或明或暗的规范层面提供论证。在这个意义上，两者的分歧是明显的。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的前提下“前后一致地”阐释与证成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构成了当代学者争论与反思的关键。其中，凯·尼尔森通过回归唯物主义辩证法，将分析视野同辩证法所蕴含的时间性和层级性结合起来，试图提供一种更为精致的论证方案，即辩证层级式的正义概念。根据这种方案，正义概念始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呈现出相互区别又不断发展的层级结构；在此结构序列中，共产主义的正义概念将是最充分的，但并非“超越正义的”。尼尔森的论证有助于缓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内在张力，为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合法性与复杂性提供辩护，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九 论马克思道德观的辩证批判性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利益”与“道德”关系的视角

曹洪军

鲜明的阶级性、科学的批判性和强烈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区别于其他道德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明确反对脱离物质利益的道德空谈,强调以现实生活实践中“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烈批判以虚假全民利益面目呈现的各种形态的道德。但这种批判却被一些人误解为是对道德的全盘否定,并称马克思是“反(或非)道德主义者”。作为源头和起点,马克思的道德观无疑影响乃至决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道德观是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关键,而缺少对其辩证批判性特质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是“马克思反(或非)道德主义”错误认识产生的深层根源。马克思对利益之于道德关系的论述遵循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其道德观的辩证批判性表征为:批判道德纯粹精神论,强调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批判道德单向利益决定论,肯定道德对利益具有反作用;批判以追求“特殊利益”为核心的“法权的道德”,弘扬“解放的道德”。马克思道德观鲜明的辩证批判性特质,不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对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理性定位社会主义道德的功能与作用、正确选择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前进方向具有鲜活的时代价值。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十 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杨立华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新时代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冲锋号!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要实现文明治理,必须实现全内涵(从文化文明到器物文明)、全领域(从经济到外事)、全层次(从个体到全球)、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全世代(所有世代)的文明治理,也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同时,要实现文明治理,还必须实现物质治理和

文化治理、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硬治理和软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大治理和小治理、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国国家治理才能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文明，并最终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摘自《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

十一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刘庆柱

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其突出特点是“五千年”而“不断裂”。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不同地区形成各自的早期神权、王权模式为主的不同“文明”，但是它们之中在此后代代相传的“文明”则是始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的夏商周、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王权”与“皇权”模式国家。这从中华的“国家”、“国民”与“国土”的五千年来基本一脉相承可以说明；从作为“国家文化”（或“大传统”）的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的“五千年”沿袭发展可以佐证；从都城的“求中”“一门三道”“大朝正殿居中”“左祖右社”格局、都城中轴线及都城、宫城四面辟门等是“中”“中和”的核心理念“物化形式”可以再现。五千年来这些不断裂文明的物化形式由少变多，反映了“中”与“中和”理念越来越强化、深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中和”理念，这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